

第一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概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种理论形态。学习和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基本内涵

正确地界定和使用概念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存有某些歧义，因此考察这一概念产生和使用的过程，分析这一概念与相关重要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地揭示出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我们进行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使用，与 20 世纪

40年代初中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其评价过程密切相连。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中提出并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这一概念。他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翌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并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这一概念。他说：“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①此后，1944年2月17日，彭真在关于中央党校第一部作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的总结中，在讲到整风运动的实质时，也提出了“毛主席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这一概念。

明确提出并使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在中共七大的重要文献中。1945年5月，刘少奇在会上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这样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应该说 前述“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等概念 较之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虽然在表述上稍有差异，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共七大正式使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同时，也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提法；而且在此之后，在党的文献中也使用过类似提法，如中共中央在 1948 年 12 月 16 日复东北局的一个电报中，就这样写道：我党“早已有了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并且早已和正在领导着我党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 经历了一个过程 它肇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一个存有某些歧义的概念，较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它以及其他几个相关概念存有不同理解所致，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 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及其内涵，无疑是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作为一种实践活动 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已开始；但如果作为中国共产党“辞典”中一个特定概念 则是在 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在这次会上 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 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

的问题。”其他同志在发言中也谈到了“中国化”问题。如张闻天在组织工作报告中就指出，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此后，这一概念在党内逐渐流行起来。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先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有机相连并同时使用的，是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说：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而正是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频繁地同时使用这两个概念，表明当时的中共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达到一个新水准，刘少奇同志的这篇报告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声名卓著的经典之作。

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存有某些争议，不妨择要列举如下：

其一可称为“等同说”，即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未加仔细区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种“理论体系”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学者这样写道：“诚如张静如教授所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它要求立足中国实际、体现民族特性、有新的理论创造以及同时代特征相结合。易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

化、民族化和新鲜化，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在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中被具体化，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会成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新型理论，并成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①还有学者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第一就是指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就是指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三就是指具有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②

其二可称为“包含说”这种观点的个中情形稍显复杂，又可再分为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③第二种则相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了作为理论成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既表示了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表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相融合的理论成果，同时也表示了一个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④

其三为“过程结果说”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

① 蒋杰：《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9年8月，总20卷（专刊）第68页。

② 黄智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和途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第8页。

③ 王天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求是》2003年第24期，第19页。

④ 师吉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涵义》锦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7年第4期，第3页。

克思主义”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有学者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结晶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最显著最集中的体现。”^①还有学者对这种区别和联系作了探讨，指出其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获得“一定民族形式”的具体过程，这一过程会由于种种原因而出现某些偏差；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具有中国的特点和民族形式的科学理论。其联系在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于和发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结果，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②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各有其确定内涵，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我们基本上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即“过程结果说”，但对“过程”的认识有所不同，同时还认为“包含说”中的第一种观点有可取之处。现将我们的观点简述如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相结合”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它由相辅相成的“两化”构成，即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而所谓“中国实际”则是一个综

秋石：《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求是》，2002年第4期，第12页。

叶险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回到马克思”》，《新视野》2003年第3期。另见毛慧：《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第20卷第3期，第117页。

合性概念，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所一贯强调的“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建设实际”、“改革实际”、“斗争实践”、“革命实践”、“具体实践”、“中国的具体环境”、“具体特点”、“中国革命经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及其经验”等。

之所以这样概括，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符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创造者所阐发的思想和观点，符合中国共产党历来认识和主张。现说明如下：

首先，关于“相结合”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意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是李大钊。他在1919年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际。蔡和森在1926年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中，也提出中国共产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际，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中共自己的理论。毛泽东则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相结合”的概念和思想。他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则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此后，毛泽东不断强调“相结合”的问题。邓小平关于“相结合”的论述也很多。1978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他进一步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

论。'此后一再重申：“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①“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江泽民同样具有非常丰富的“相结合”思想。如他在庆祝建党 80 周年讲话中指出：“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

其次，关于“两化”的思想。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强调了对“中国实际”之组成部分的“历史遗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总结并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重要性。1939 年他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指出党的任务是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至 1941 年，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中更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口号。他这样说道：“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③刘少奇对“两化”也有许多论述。1939 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论述“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时指出：一方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13 页。

同上书，第 63 页。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74 页。

我们要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另一方面，我们要虚心地倾听意见和批评，仔细地研究生活中、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细心地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根据这些去检验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是否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否正确，去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而加以纠正，去改进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要根据新的经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个别结论，在哪些个别方面，需要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1943年，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中特别强调了对我们党经验进行“马列主义的总结”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党有各方面的极端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好把它总结起来。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指导，很好地总结我们党在各方面的斗争经验，还是今天我们全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为这些经验的马列主义的总结，是团结全党、教育全党、提高全党以至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环。”此后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更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视为“相结合”、“相统一”和“两化”的结晶。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

再次关于“过程和结果”的思想。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概括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把我们党的发展过程，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最为全面和精当的是江泽民。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这样指出：“大会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他更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特别要提出的是在此后的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有一个经典性的表述，他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此外，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

我们要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进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

所谓内涵，是指某一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当前学术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基本内涵的理解，除了前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纠缠在一起的观点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因此，我们除了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外，还必须对其他观点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基本内涵。

当前学术界的一些观点主要还有：

其一 有学者指出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三层含义 其中两层是明显的含义，一层是潜在的含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内涵上有两层含义：一是它坚持和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立场和方法；二是它充满了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点、立场和方法的鲜活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新经验、新观点和新方法，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开放性的特征。概括地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最集中地反映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理论形态所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存在形态、表现形态和作用形态。当然，除了这两层明显的含义以外，还有一层潜在的但却不可少的含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否则就无所谓中国化。由于时代不同、国情不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也会在在

容上有所超越和发展。”

其二，有学者指出，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思想渊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的指导思想是 19 世纪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成长与发展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

其三，有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内涵”主要有五点：“（1）坚持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2）中国革命和建设独创性经验的科学总结；（3）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4）人类文明的成果；（5）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通俗的语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上五个方面的融合。”

其四，有学者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点和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特性和中国气派。所谓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

- ① 王鑫：《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 第 16 页。
- ② 金尚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海南大学学报》，2001 年第 6 期 第 1 页。
- ③ 沈宝祥：《略论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和中国化》，《浙江社会科学》2001 年第 6 期 第 7 页。

中，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简析上述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涵，包括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新经验。应该说，这种理解把握了最重要的东西，但还有某种缺失。第二种观点，仅从“思想渊源”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这本身有欠考虑，因而由此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括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的这种理解也是有缺陷的。第三、第四这两种说法虽然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在实际所指上却有重要共识，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包括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应该说，较之第一、二种说法，这样的理解更符合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认识，当然亦就更全面更恰当。因此，本文对这种理解持基本赞同态度，但也有所不同。

我们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包括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包括有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成果。这种理解，可以直接以江泽民“七一”讲话的有关内容为依据：“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这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构成要素所进行的明确而精辟的表述。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江泽民同志从理论、实践、文化传统的三个相互联系的侧面，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前提和要素。这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涵的新的科学概括，因而大大提高了人们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认识。”^①江泽民这段话中的所谓“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以理解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运用；而所谓“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则可以理解为在“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造。当然，特别要说明的是，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两个组成部分也不是各自独立并平分秋色的，事实上，它们之间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有机体。还应当说明的是，江泽民的这种概括，实际上也是以党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并在党内某些一贯提法的基础上，加以总结和提炼而成的。只要我们看一看中共七大的相关文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的报告等，就会觉得此言不虚。

总之 我们认为 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即是指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理论和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中国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将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第二节 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依据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同时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教育运动，也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而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式形成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更成为全党常抓不懈的“战略任务”。党中央不断发出号召，要求全党要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①要在全党“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②“兴起一个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以及“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等等。学习和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长期性和重要性，是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一系列规定性所决定的，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59—60 页。

②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载《人民日报》1997 年 9 月 22 日。

③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50—51 页。

改革的实践需要所决定的。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所谓指导思想，就是占主导地位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①中国共产党在长达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一直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并先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在这面旗帜上，作为自己行动的南针北斗。

1945年中共七大第一次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种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确认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②。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国后，又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第350页。

^②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载《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理论形态——邓小平理论确认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①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了改革开放，加快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0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新世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六大，再次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理论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认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党总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三年基本经验所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

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载《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2004年9月。